

大学与文明间的对话

[加]许美德

(香港教育学院,中国 香港)

[摘要]联合国把 2001 年定为“文明对话年”。自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冷战结束后,文明间对话这一概念开始出现,由哈佛大学教授 Samuel Huntington 发起的对潜在的文明冲突的讨论,引导世界各国学者努力探索大学如何在这种文明对话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植根于中国、印度和阿拉伯这三种主要东方文明的知识观和高等教育组织模式,对在全球范围内重塑高等教育有很大的帮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文明中的女性在高等教育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女性获得了知识将有利于大学积极参与文明间的对话,有利于大学在其知识定位方面达到地区和全球的平衡。

[关键词]大学;文明;女性;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0 - 0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942X(2002)03 - 0103 - 06

笔者这篇论文的主题是关于“文明对话”以及它给大学带来的挑战,特别是给大学女学者带来的挑战。

联合国宣布 2001 年为“文明对话年”,其目的在网上有具体的阐述:“强调当前的全球化过程不仅仅是包括经济、金融和技术方面,也必然包括人类的文化、精神诸方面以及人类之间相互依赖及其丰富的多样性。”[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个对话看作是“人类可持续和合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通过培养道德心和植根于历史及传统的人类生存的共同基础,使全球化趋于人性化,并为持久的和平奠定基础。”

考虑到确定的知识模式的优势和大学传统的认识论方法,本文的中心是关于这次对话给大学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笔者尤其感兴趣的是探究大学女学者或许有助于克服这些模式的限制,并促使大学积极参与到这个对话中来。

也许可以从笔者的一些个人经历开始阐述这个论题,因为正是这些经历使笔者对文明间的对话产生兴趣。从 1989 年下半年开始,笔者作为一名外交官在北京生活了两年,负责加拿大驻华使馆的文化、学术和科学事务。1991 年回到加拿大从事大学教职工作,就在重返学术生涯的时候,1991 年 9 月苏联突然解体,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在加拿大国际发展局的支持下,笔者负责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项目,该项目包括中国的六所师范大学和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加拿大国际发展局的观点是,加拿大作为一个发达国家,能够帮助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提升其学术水平,并为中国年轻的学者提供接触国际环境的机会。这是那个时候官方发展机构共同的思想。然而,我们自己的思想与这种思想有很大差异。我们认为,加拿大的教授和博士生们与中国大学的同仁合作、向中国学习,这同教中国人一样重要。我们把中国看作一个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和教育遗产的国家,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大量的知识和真正的智慧。因此,这个项目是作为一

[收稿日期] 2002 - 01 - 24

[作者简介] 许美德(Ruth Hayhoe, 1943 -),女,原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学部主任、教授,现为香港教育学院院长、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及比较教育研究。

种对话来进行的,涉及大量的相互学习,既提高了中加两国的学术水准,又使两国年轻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与相互交往与日俱增。

在某种程度上,冷战结束使我们能跳出诸如不同的国家制度以及“发达”和“发展中”这些范畴,作为人类来相互接近,寻求在独特的、不同的文化传统背景中相互理解、相互欣赏和相互学习的基础。在研究这个项目的最初几年中,我们组织了一个国际会议,议题是“跨文化的知识:东西方大学”,召集了来自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三个主要东方文明国家在科学和社会知识领域的高级学者,共同思考这些文明对现代发展的贡献以及它们对欧洲启蒙运动与西方文明的影响。会议的论文集在1993年分别以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出版。同年,Huntington发表了他的引起争论的论文《文明的冲突》。2001年,笔者应邀到香港准备修订再版该论文集,以纪念联合国的“文明对话年”。笔者在本文中将提到这本书的一些章节。

现在再回到那个中加两国大学教授、博士生合作的项目上来。在那次国际会议上,我们打算资助该项目并为其创设一个研究背景。在项目早期阶段,以博士生身份被送到加拿大进行项目研究的中国青年学者多数是男性。我们敦促中方大学的领导也挑选一些年轻的女学者。起初,我们被告知没有女博士生,但当我们坚持的时候,我们发现确实有女学者在做教育方面的博士学位课题研究。她们中的多数人是在职研究生,或由于家庭的原因,她们不便出国。最后来参与项目的加拿大的22名年轻学者中有9位是女性,参与这个项目的加拿大学生和教授大约有一半是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项目中的女成员变得越来越踊跃。在1995年项目完成时,我们又启动了第二个项目,时间跨度是从1996年至2001年。该项目重点在于研究中国的女性和少数民族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推行者,它由山西师范大学的一位女教授主持,五年的合作使得双方的女领导显著增加。

因此,笔者想要说的是,女性看来有特别的能力参与文化与文明间相互尊重的对话,原因可能是把我们割裂开来的某些范畴来自于男性创造的知识形式和思考世界的方式,这些范畴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往往在男性的头脑中比在女性的头脑中更加僵化。

让我们举一个西方大学的例子。在12世纪西方的大学产生之前,也就是八百年前,欧洲的女性主要通过诸如修道院、教会学校这样的组织积极参加学术与宗教领导活动。其中一位女性因为她的歌曲在最近重受青睐而再度扬名,她就是Bingen的Hildegard,一位9世纪的女修道院院长。她的著作涉猎广泛,并同教皇和王宫贵族常有书信往来[2](p.144)。然而一旦大学出现后,欧洲女性正式参与高层次学术领域的活动就受到排斥——一名学者就将他的一本关于大学的早期历史的书定名为《没有女人的世界》[3]。直到19世纪中期,女性才开始通过长期而艰巨的斗争让现代大学接受她们。首先成为学生,后来成为教授,近来多数人还做了系主任和校长。有位女学者把这个过程描述为“攻占象牙塔”[4],即把大学比作象牙塔。笔者在2001年9月4日《纽约时报》上读到一则令人振奋的报道,说现今美国大学女校长的比例是19%,总人数是400多人,高于1986年的9.5%,其中有3位是常青藤联盟大学校长,而八年前一位也没有。《纽约时报》还把这同“财富”500家公司中的5名女执行总裁进行了比较(常青藤联盟大学的数量远少于“财富”500家公司)。

大学往往决定什么种类的知识是高级知识,对有价值的和重要的内容将设置标准。随着19世纪现代科学的出现,以及在解决多种问题上科学方法的有效性和巨大的生产效率,一个有价值的自由、客观的科学概念在认知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逐渐得到最高的尊重,且支配着大学的文化[5]。社会知识,有时甚至人文知识也往往被认为有同样标准——科学的客观及公正性,统计上的严密及证据的量化。

但女性始终这样认为:有其他许多的认知形式,在这个客观主义的认知框架内只有一些现实的方面能够被理解。我们知道,西方通过现代科学的发现和运用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西方在环境、健康、家庭生活、社会凝聚力等方面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女性们可能最担心的还有

冲突和战争。我们知道，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里存在着智慧和知识，如果我们有机会相互尊重对方的话，可能有助于解决一些“未曾意料到”的“进步”的结果。

只有女性发现自己在现代大学作为学生和教授的地位后，她们才能批判性地对待这个在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知识模式，并对已逐渐主导大学学科的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提出一种男女平等主义的主张。学者如 Sandra Harding[6]和 Carolyn Merchant[7]在此项工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此，笔者想引用美国女社会学家 Elise Boulding 在其书中所说的话，该书书名为《建设一种全球公民文化》，于 1998 年首次出版；书中阐述了获得知识的一种更平衡和整合的方法，而不是近来在大学逐渐得到最高尊重的科学主导方法。Boulding 认为，有四个方面的知识对全球公民文化的发展是重要的，它们就是认知的、情感的、直觉的和审美的。

“认知能力帮助个体把新信息应用和整合到已有的心理结构中，并形成评价信念的新标准。当个体能够协调个人的需求与他人的需求并与他人形成共鸣时，或者当他们在面对多种选择时能够显露出受过训练的、有意识的行为时，显然他们已具备极强的情感能力。个体的直觉能力的成熟表现在他/她从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接受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由经验的程序所证实。”[8](p. 100) 最后，“个体审美能力的发展也许有利于来自不同国家的全球公民之间的交流，美的表达能被用来补充书面的交流”[8](p. 88)。

笔者在此已尽力说明，因为女性与上导大学知识的传统观念接触较少（因为这些知识的最初发展来源于一个完全男性的学问世界），她们更易于使知识的认知方法同其他种类的知识与理解方法平衡，这在若干重要的方面可能有助于文化与文明的对话。西方世界之外的女性怎么样呢？在笔者看来，考虑到大学是外来的移植植物，要么是在殖民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被强加给她们的，要么是国家感到大学对他们的现代化成功很重要而自愿采纳，在这种情形下，她们可能更少接触到大学的关于知识的观点和模式[9]，因而，关于大学的知识价值观在非西方文化中并非根深蒂固。

让笔者来举中国这方面的例子。一方面，或许有人会说，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像翰林院、国子监、书院，同西方的大学一样对女性不公平。当然，自宋代新儒家大学者朱熹以后，女性就不允许正式参加高等教育的学习[10]。想到这样一个事实是很有趣的：尽管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中国和欧洲的女性却在同一个世纪被排斥在高等教育学习之外。就像欧洲 9 世纪和 10 世纪女性积极参加学术活动一样，在中国唐朝，由于佛教开明思想的影响，女性也有机会参加学术活动[11]。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主导学术文化的儒家思想，支持神圣的和整合的获取知识的方法，允许认知、审美、情感和直觉的理解形式存在，与狭窄的实证主义认识论截然不同；它支持科学创新，事实上激发了极其成功的传统科学，直到 16 世纪、17 世纪在欧洲甚至还受到羡慕[12]。然而，传统科学从来没有获得像欧洲那样的主导地位，一些人也许觉得这对他们是不利的。当然，到了 19 世纪，中国的领导者觉察到了这种情况，他们采纳了西方式的大学和现代科学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努力目标之一。

所以，这时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出现了：一方面，儒家的学习形式比欧洲大学的模式对女性的教育方式更为开放，它更支持一种整合地、神圣地看待人类问题的方式；另一方面，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独尊儒术，教条式的儒家思想使中国女性与欧洲女性相比，在受高等教育方面机会更少。这看来就是当时的情况，尽管近来历史修正主义学者的研究已表明，在晚明的繁荣时期，女性已能创造出她们自己的学习圈子，并通过极其丰富的出版物来交流研究成果[13]。

笔者自己对现代大学在中国的发展的研究表明，中国女性找到进入大学的途径比西方更容易，并且她们能够相当积极地参与现代学科的构造。这也也许可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20 世纪早期的中国男性对女性在过去历代王朝所受的侮辱是敏感的，每次与侵占中国领土的洋洋自得的西方列强相比，他们都感到了中国所处的受侮辱的地位[14](p. 366)。

在本文的总结部分，笔者想谈一些文明和跨文化中的女性的认识和交流方法的事例。这些例

子来自女作者撰写的修订版《跨文化的知识:对文明间对话的贡献》一书中的某些章节,希望这会表明,当女性参与正在出现的文明间的对话的时候,她们的学问对大学来说可能是一种特别有用的资源。笔者尤其关注的是知识的多样性及各种获取知识的认知方法。这些女性对对话的贡献是明显的,正如男性学者对此书的丰富多样性的贡献是明显的一样,但这并不表明这些获取知识的方法对女性是排斥性的,相反,由于历史的原因,也与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女性或许更容易接受这些获取知识的方法。

试从 Ursula Franklin 开始谈起。她是多伦多大学杰出的冶金学荣誉退休教授。她的冶金学研究使她调查了古代中国的青铜,追溯到公元前 6 世纪,从科学观点来看,当时显然很先进。Ursula Franklin 的注意超越了纯粹的科学调查,考察了能了解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东西,发现了那个时代显著的劳动和生产组织模式,并阐述了道德和行为的正确表达方式,或者可以称之为儒家的“礼”。以此为基础,她继续在技术上做开拓性的工作,探讨诸如社会教育制度、现代技术社会和文化含义等问题。她因此表示,技术必须放在它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理解,它不可能作为中性的因素或普遍的规律简单地跨越社会和文化的界限。

第二位女撰稿人 Samiha Sidhom Peterson 是来自埃及的一位社会学家,她研究的主要是一全民基础教育领域知识的传递过程,涉及国家和国际辅助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及其他机构。她的注意力放在知识传递被协调的四个层面上——国际、国家、组织和个人,显示每个层面上参与制定、采纳和实施政策的人们怎样深受他们自己的价值信念的影响,并且这些影响对被传递的知识有渗透作用。她从以上四个层面作了阐释:(1)在国际层面上关于发展的不同观点的相关政策争论;(2)在国家层面上近年来埃及致力于基础教育的观点(在特殊形式的教育发展和师范教育中,埃及已从“全民教育”转向“全民优质教育”);(3)在国家行政组织层面上这种组织的文化背景的观点(其组织成员同国际机构有联系);(4)个体对价值和义务的理解是在所有层面上长期成功实施教育政策的关键的观点。

第三位撰写人是 Verna Kirkness, 加拿大“第一国家共同体”成员,英国哥伦比亚大学“第一国家学习社”前领导人。她主要研究来自加拿大第一国家背景的学生与大学的相互影响,把“来上大学”和“去上大学”进行了概念的区分。年轻人将全部被大学文化同化,这种希望同“来上大学”联系起来;然而,学生自己的一系列不同期望,却同“去上大学”联系起来。他们期望能从自己的口耳相传的传统和他们的人民精神文化遗产中贡献有价值的洞察力和理解形式来获得尊重,并致力于同主流学生和教师进行互利的对话。Kirkness 的论文展示了既在国家层次上、又在国际层次上可能为大学带来一些学科知识的美好前景,而其先决条件是在讨论中各方乐于尊重来自不同地区的丰富智慧,并将之整合到讨论中去。

而在地球的另一边,Renuka Narang 写到她在孟买大学的开拓性工作。她提出了一个针对农村女性的教育扩展计划,让大学生参与教学并指导扫盲工作。这所大学是印度一所最古老、最有声望的学校,有非常高的国家地位及繁多的国际联系网络。该大学表扬了那些从事农村女性工作的大学生,并要求他们记录在此过程中学到的所有东西,因此,学校在印度农村促进了人们通晓本土知识,并为大学融入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巩固了大学在印度本土文化中的根基,使学生获得了接触到真正生活的机会,并借此来考察那些文化的根基[15]。

最后是 Zahra Al Zeera, 来自巴林的一位女学者。她对社会科学中的四个范式提出了自己清晰而精确的概述和评论:首先是实证主义,然后是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她指出,一条“看不见的线”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并都植根于亚里士多德的“不是一就是”原则。她运用了伟大的伊斯兰哲学家 Ibn Sina 和 Al Ghazzali 的思想,提出了社会知识的伊斯兰范式,该范式使身体、心智和灵魂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并把个体和社会推进到更高的阶段。Zahra Al Zeera 认为,在伊斯兰国

家，大学的基础理论应该以伊斯兰范式为基础；一般来说，伊斯兰范式将有能力既包容社会和生活的整体，也包容人类的整体，这将有助于克服个体和社会的分裂和两极分化，而这正是神圣的、整合的知识的任务[16](p.59)。

上文中，笔者阐述了《跨文化的知识：对文明间对话的贡献》这本书中多种获取知识方法的一些深刻见解。我们高兴地了解到，该书在出版英文版的同时，也将有中文版面世。我们希望它将激励更多的大学学者积极参与联合国在新千年的第一年特别强调的这个对话中去。

（本文为许美德博士在浙江大学举行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

【参考文献】

- [1] Unesco.Org. dialogue 2001 [EB/oL]. <http://www.Unesco.org/dialogue,2001>.
- [2] Peter Dronke. Women Writers of the Middle Ag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3] David Noble. A World Without Women: The Christian Clerical Culture of Western Science [M].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2.
- [4] Suzanne Stiver Lie, Virginnia O'Leary. Storming the Tower: Women in the Academic World [M]. New York: Kogan Page, 1990.
- [5] Hans Weiler. Knowledge, Politics and the Higher Education [A]. Ruth Hayhoe, Julia Pan (eds.). Knowledge Across Cultures: A Contribution to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M].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 [6] 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 [7] Carolyn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M].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1980.
- [8] Elise Boulding. Building a Global Civic Culture: Education for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88.
- [9] P. Altbach, V. Selvaratnam (eds.). From Dependence to Aut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Asian Universities [M]. London: Kluwer, 1989.
- [10] Bettine Birge. Chu Hsi and Women's Education [A]. W. T. de Bary, J. Chaffee.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11] Kathryn Tsai. The Chinese Buddhist Monastic Order for Women: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A]. Richard Guisso, Stanley Johannessen (eds.). Women in China: Curr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M]. Lewiston,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1981.
- [12] L. A.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M]. San Antonio, Texas: Paul Anderson Co., 1946.
- [13] Dorothy Koh.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14] Chen Yiyun. Out of the Traditional Halls of Academe: Exploring New Avenues for Research on Women [A]. translated by S. Katherine Campbell, Christina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el and T. White. Engendering China [M].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5] Renuka Narang. Social Justice Through Non-Formal Education and University Extension Education: An Indian Case Study [A]. Ruth Hayhoe, Julia Pan (eds.). Knowledge Across Cultures: A Contribution to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M].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 [16] Zahra Al Zeera. Paradigm Shif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East and West [A]. Ruth Hayhoe, Julia Pan (eds.). Knowledge Across Cultures: A Contribution to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M].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责任编辑】徐 枫

Universities and th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Ruth Hayhoe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The United Nations has designated 2001 as the “Year of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This presentation will explore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a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the early 1990s, and the debates over a potential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nitiated by Harvard Professor Samuel Huntington. The focus of the presentation will be on how universities may take an active role in this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Views of knowledge, and institutional patterns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are rooted in three major Eastern civilizations, the Chinese, the Indian and the Arabic, have much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reshap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global arena. Particular attention will be given to the role of wome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Some examples are given of how women’s approaches to knowledge may facilitate universities in entering actively into dialogue with other civilizations, and in balancing the local with the global in their knowledge orientation. Women contributors have provided some examples of women’s ways of knowing and communication within and across civilizations in the revised version of Knowledge Across Cultures which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n universities and th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published of late years. From th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y have introduced reformation and achievements in their homelands. Take, for example, Ursula Franklin who is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emeritus of metallurgy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Her studies and attention went beyond pure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She thus drew a conclusion that technology must be understood in its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and cannot be simply transferred across soci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as neutral or universal set of rules or principles. Take another example of Renuka Narang who had made every effort to do her pioneering work at the University of Mumbai in developing a program of extension for rural women. Through this program the university promotes awareness of indigenous roots of knowledge in rural India, and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 university to enter into all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university; civilization; women; higher education

(张雁译,肖朗校)